

对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几点思考

顾建亚

(浙江科技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对道德问题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演化为对道德教育变革与创新的呼唤,学校道德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和重要。文章立足于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道德生活变迁的大背景,对21世纪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思路。

关键词: 道德变迁;道德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3)03-0188-05

道德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后代。”这话出自联合国教课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之口。21世纪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培养和塑造出新时代所要求的具有新的素质、新的精神面貌的一代新人,而道德素质是人才素质的最重要方面。因而,面对转型期社会道德领域变革和理论思考,积极抓住有利的契机,推进德育改革进程,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是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1 社会道德变迁及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20多年来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更新和变革。然而,我们在感受道德进步的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境。

第一,道德生活环境复杂化。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社会道德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总的来说,道德的历史性进步是占主导地位的。新的道德观念得到了培育和发展,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正在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但是,在道德文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背道而驰的现象,使个体道德行为选择日趋复杂化,由此伴生一些道德观念上的困惑、心理上的冲突和行为上的偏差。尤其在改革初始,道德失范现象出现并加强,人们偏信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生活中表现出浮躁和缺乏责任感。

第二,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扩大,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主宰人们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一些道德观念重新受到审视,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且相互冲突,各种思潮交叉互动。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旧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在不少方面同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丧失了原有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未深入人心,在群众中扎根。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以致出现了道德“空档”或多种道德观念并存的局面。对于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新的思想行为,因为观念不同,对它的评价也不同。有相当一部分人的道德认知出现茫然、无序和困惑。

收稿日期: 2003-03-14

作者简介: 顾建亚(1971—),女,浙江慈溪人,讲师,主要从事高校德育教学与研究。

第三,道德控制手段弱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道德与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社会生活的高度有序性和规范性,得益于道德与政治原则、政治手段合而为一作用于日常生活的结果。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时,传统的以政治为核心的道德约束机制发生了松动,而就目前道德建设现状来看,规范、监督、保障手段还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匹配的新型道德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新旧体制交替使得社会规范不定型,国家对不同利益群体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和监控手段,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社会赏罚缺乏力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道德控制手段又面临新的挑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机犯罪问题和道德冷漠现象。

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社会道德的变迁,使学校道德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压力。教育问题普遍受到关注。社会对青少年道德危机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演化为对道德教育变革与创新的呼唤。学校道德教育的作用和地位日趋重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教育取得了显而易见的进步,但是仍未达到预期目标。因而,要紧密结合社会精神文化的新发展,结合学生思想观念的新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学校道德教育的新方法、手段和机制。

2 21 世纪学校道德教育的几点思考

2.1 以创新教育为依托,强化人格教育

创新教育是揭示、展现和强化人类的最高本质即创造性的理想化教育,创新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引导青少年具备健全性人格、自主性人格、创造性人格、和谐性人格,促进当代青少年的人格现代化。转型期的我国道德教育是创新教育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创新教育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其目的是要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我国2001年11月举办的“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高级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高素质人才涵义的诠释是具有高创造性和良好的人格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主要不在于其专业知识,而在于其人格,其道德;创造性的核心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价值取向问题^[1]。这是建立在学习化社会的教育目标,我们一贯以知识教育代替人格教育,所以高素质人才出不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国际教育基金会总裁(IET)石峻昊博士曾中肯地指出:“在你们追求更高的学术与科技教育的同时,千万不要忽略青年人的人格教育。否则,你们将会重复西方的严重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西方得到的是犯罪、道德败坏、家庭的崩溃与其他种种的有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科技的失败,而是最基本的教育的失败。”^[2]

近年来,健全人格教育成为了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凸现的重要内容。在美国,个人的独立、平等、自由意识、乐观进取精神,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品质被认为是健康人格的重要表现。德国教育家鲍勒夫(O. Bollnow)提出“朴素道德观”,主张重视人格教育,提倡负责任、坦诚、正直、同情他人、乐于助人、尊重他人、举止端正等个人品德方面的教育。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弱点之一,就是比较多的单纯向人灌输这样那样的具体规范,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同正确地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这样的道德教育就很难取得长远、稳定的良好效果^[3]。因而,在现阶段我国要特别加强对学生的责任感、爱心、勤俭朴素、诚信等教育,大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发展自信开朗、竞争进取、富于想像的创新人格,增强适应变化、承受挫折、坚忍不拔的心理素质。学校可以组织诸如爱心教育系列活动或建立诚信教育机制等措施,通过树立典型榜样,加强校园舆论的导向和监督功能,使学校教育和个人的直接生活体验相结合,引导和强化学生正确的是非判断能力和善恶评价标准,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人格特质,使之在改革的浪潮中扬善抑恶、从善如流。人格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实现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环境的有效整合,使之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2.2 构建“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模式,增强人际互动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冷淡日益加剧。不少人终日沉溺于虚拟的社会中,他们对那未曾谋面的人付出满腔热情,而对身边的人不闻不问,视而不见。苏霍姆林斯基在陈述他的教育经验时说“要求每个人从幼年起就会关注别人的精神世界。”“要让孩子会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忧伤和不幸,并和需要同情帮助的人共忧患。”“使每个人的个人幸福来源于极其亲密的个人关系中的纯洁、美好、高尚的道德。”^[3]

现在的独生子女,从幼年起便生活在一个适宜个人中心观念发育的家庭环境中,缺乏同龄人交往的机会,而德性的发生是通过儿童群体内和与成人之间互相接触而自然实现的。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个人的觉醒,人的主体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也造成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主体性教育模式旨在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充分鼓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批评意识,在具体的个体成长过程,重视学生的自我建构,这并没有走出个体主义的窠臼。所以道德教育急需拓展视野,以全新的理念来指导德育实践,在基于人际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构建“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模式。

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相互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德国的胡塞尔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而这些“自我”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世界既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自我与他我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而形成一个共同体,单一个体也因此而过渡到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是通过“共观”“统觉”“移情”等等而实现的。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存在并非以一个独立的个人做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做起点。从人存在的基本层次看,这意味着交往是人性的一种本质,或者是说人际间的相互理解是人存在的基础要求。这种双向理解正是在没有内在和外在压力与制约的理想交往情境中所达成,由此所形成的,也正是所谓的“主体间性”^[5]。哈贝马斯对交往意义的诠释为突破个人主义对当今社会的主宰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因而也为我们道德教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道德教育只能是人理解人的教育,而这种理解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而实现。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他特别推崇让学生在相互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发展道德思维。他指出,在儿童同伴间所进行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交际和合作活动日益成为道德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主体间关系是在语言共同体中通过对话形成的相互理解的关系。反映在教学上是一系列的互动过程,要充分有效的互动,既包括师生之间,也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乃至学生与社区人之间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去除自我中心达到彼此理解与交融的过程。因而,还需积极拓展道德教育空间,大力发展实践教学,加强校区合作,充分挖掘社区德育资源,营造学生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和增强人际互动的良好氛围。

2.3 整合道德约束与引导机制,完善发展性德育

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规范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的真正自律也只能通过自觉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来达成,而个人的理性是不自足的,还必须综合运用种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加强道德的制度化建设,来促进和完善发展性德育。

首先,要建立压力型制度,它告诉和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限制了人们活动的范围。这是对人们自发的行为进行逆向校正和抑制,但它不能积极地对每一个平凡个体的挫折性遭遇都及时施以有效的个别性关怀和帮助。因而,还要通过建立救助型伦理制度,在制度层面把救助性、关怀性道德行为和道德力量制度化、体系化。救助型制度是对内在需要满足进行扶持和帮助,是一种良性循环的道德奉献与回报机制。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如果只承认道德义务,不承认道德权利,或者说道德权利没有取得合理的地位,道德只要求人们履行义务,却又不强调回报这种奉献德行,就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因而,建立公正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最终促进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

再次,要建立一种激励型制度,即通过一定的激发、奖励机制,使履行道德义务、维护善的道德力量,成为个体发展自我,积极向上的必然选择。人总是想积极向上,或出于自愿或迫于竞争,把提高个体道德水平与实现自我价值、发展自我挂钩。激励型道德教育实际上是为个体设置了一个努力目标,在这种制度下,道德教育不再纯粹是一个孤立的被动的事物,而成为个体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的目标。个体内在地把各种德行的形成、道德人格的发展作为自身的一种需求,通过道德教育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这就是德行的本体价值的体现。因而,学校要积极构建以道德需要为核心的高校德育激励系统。实现高校教育目标一方面不能脱离社会需要,应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调整对大学生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与大学生自身需要相结合,不断根据学生需要调整道德教育的微观目标,并在变化中寻找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评价,也要考虑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并将道德评价的结果作为大学生道德行为的激励动因,以便在随后的道德

行为中更为有效地实现既定的道德目标,这就是说,道德教育工作应从目标的建立到结果评价,都应充分考虑到道德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形成科学的激励系统。

在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学会做人,是立身之本;掌握广泛的知识,是立身和服务社会的手段。以强调做人为核心的发展性德育把学知识与学做人,道德教育与个人成才内在统一起来,其目的是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和解放人。因而,主张在生活中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与安宁。正如康德所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与敬畏——我们头上的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6]

2.4 推进制度化德育建设,优化制度的德育功能

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往往是公德与私德不分,或重私德而轻公德,其表现是过分地诉求于个人,而对于社会的公共道德规范建设与实施下功夫不多。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这种道德思维方式的典型,它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的修养,而不承认或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体制、环境、公共规则的作用。因而,现代道德教育要超越出个体道德,强调把个体道德教育与制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制度的道德教育功能。当前的道德问题在物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即经济领域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制度道德显得比个体道德更重要。腐败不单纯是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而是主要与制度的种种缺陷有关;先进人物的个人示范虽然重要,但不能主要靠它,个人示范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是要靠制度示范,制度能管住很多东西。因此,这意味着首先要考虑制度是否有公正性,运作是否合理。道德建设不能脱离体制改革,要与社会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机构的改革配套进行,同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相互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制度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公正性,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

就学校道德教育而言,学校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缩影,它的形成与运行是塑造学生规范意识的外在影响因素之一。笔者认为,推进学校制度性德育建设主要是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制订完备的德育制度?第二,这些制度有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第三,制度本身是否合理?

德育制度主要是指观念形态的规范体系,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系统化的和形诸于文字的行为规范,如学生守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制度(考勤制度、课堂纪律、考试制度、图书馆规则等),生活管理制度(作息制度、宿舍管理制度、食堂规则、卫生检查制度等),其他学生工作制度(学生干部培养考核制度、社团管理制度等)。

就目前而言,上述系列制度作为学校的管理手段,已被普及了,但是,它们在学校德育实践中的重要地位还没有引起实际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首先,表现在制订制度与实施制度的脱节。有些制度措施仅停留于文字层面,没有真正落实,使制度形同虚设,令学生对此失去信心。

其次,体现在有些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不合理,贯彻得不够具体、明确。比如,学校组织学生守则考查,但学生根本没记住,也没意识到不遵守制度的危害性。因此,要对违纪现象的后果加大宣传力度,让学生从根本上了解各项制度,真正转化为学生内在的意识。

再次,就是制度本身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如果不排队总是可以得到好处而不受到有效的惩罚,那么号召人们排队则是徒劳的。正如爱尔维修所指出的: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要使学生制度能有合理性和针对性,有必要让学生参与制订和选择德育制度。因为德育制度要真正起到对学生的教育导向作用,必须征得学生的理解和同意。为此,学校管理者需要具备民主意识,淡化权力色彩,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尽可能鼓励和激发其成员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努力使制度符合学校成员的共同需要。

3 结束语

在人类共同瞩望的新世纪中,中国道德教育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有道是: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之计,

育人为本。21 世纪我国学校道德教育要主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德理念。社会在进步,人在进步,我们的道德教育也要随时代不断进步,才能充分承担起它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 [1] 楼世洲,周国权,潘正文.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人才[J].教育发展研究,2001,(1):83-86.
- [2] 贾仕林,崔景贵.国外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启示[J].青年探索,2001,(5):4-6.
- [3] 李德顺.从情感到理性——关于我国当前道德形势的再思考[J].教育研究,2001,21(5):37.
- [4] 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M].赵玮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237,241.
- [5] 兰玉萍,王有升.论交往的教育学意义[J].上海教育研究,2001,(2):11-15.
- [6] 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道德教育当代转型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0,21(7):3-10,54.

On current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GU Jian-ya

(Dept. of Social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ociety's moral life in China has greatly chang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reflections of people on society's moral problems caus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moral changes of society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s paper offer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moral education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moral changes; moral education; reform

(上接第 187 页)

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教学组织者的个体行为,如同人的个性,应该具有特色。但是,教学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笔者认为,适当地总结、概括及相互学习将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赵秀英.对比在短期强化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3):38-39.
- [2] 皮连生,朱燕,胡谊.教学设计——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3] 胡春洞.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4] 邵瑞珍,皮连生,吴庆麟.教育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 [5] 曾葡初.环境意识与外语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9):28-30.
- [6] 周星,周韵.大学英语课堂教师话语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59-66.

On German pedagogy in the cooperative training project

WENG Zhen-hua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objects and teaching purpos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German pedagogy in the “2+3” cooperative project. Moreover, it puts forward pedagogy, such as situation dialog, comparison and teaching in two languages.

Key words: German teaching; situation dialog; comparison; teaching in two languages; cooperative project